

数字普惠金融新逻辑：从“输血”到助力“造血”

汪依林

当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阶段,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鲜明主题。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应有之义,而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企业的持续成长离不开高效、便捷的资金循环。换言之,融资模式的创新与迭代,已逐渐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变量之一。近年来,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催生了数字普惠金融,其突破了传统信贷模式下对物理网点和抵押物的路径依赖,也改变了传统金融资源配置中偏向大型企业的既有格局,使长期处于信贷市场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得以获得更为平等的融资机会,为企业融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契机。因此,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融资的核心机制,客观审视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对于推动企业融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融资的核心机制

一是降低资金获取的边际成本,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在传统信贷模式下,金融机构为覆盖必要的尽调成本与信用风险,通常会在定价中体现相应的风险补偿,而对于利润率本就偏薄的中小微企业而言,无疑会加剧其融资压力。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全自动化、批量化、智能化的信贷审批系统,大幅压缩了人工审核、纸质材料流转及网点运营等环节的成本。边际运营成本的显著下降,直接传导至终端利率,有效降低了企业的利息支出,优化了企业的财务费用结构。这不仅缓解了企业“融资贵”的难题,也使企业能够将更多资金配置到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等核心业务中,从而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二是弱化抵押担保依赖,重塑企业信用资产。传统融资模式高度依赖厂房、土地等有形抵押物,大量轻资产的科创型、服务型企业因缺乏合格抵押品,在融资过程中往往面临较高的门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合法合规地引入税务、工商、电力、物流及供应链交易等非结构性数据,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将企业的日常经营行为转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数字信用评分。这种“数据即信用”的模

本文系统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融资的三大核心机制,并从与传统融资对比、企业规模差异、长短周期效应等维度展开多维分析,进而剖析当前面临的数据安全、算法同质化等现实挑战,提出制度、技术与人才等方面的优化路径,为企业融资创新与数字金融发展提供参考。

式,成功剥离了信贷发放对不动产抵押的刚性依赖,使企业的创新能力、履约记录和商业口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融资本金,极大拓展了信用价值的边界。

三是提升融资的时效性与灵活性,强化企业抗风险能力。传统信贷审批周期长、放款慢,难以匹配中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资金周转需求。数字普惠金融则提供了构建全天候在线服务平台的可能,使信贷审批从申请、授信到放款实现秒级响应,审批流程与效率大幅提升。这种极高的时效性,既有助于企业迅速捕捉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也能在遭遇突发流动性危机时支持其快速自救、最大程度规避损失,从而显著增强企业的财务韧性 with 抗风险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融资模式的多维比较

一是传统融资模式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比较。传统融资模式与数字普惠金融在资金获取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传统融资通常具有资金体量巨大、期限较长的特点,依托于成熟的线下风控体系,能够为企业提供大额的基础设施建设或长期并购资金;但其对财务报表规范性有着较高的要求,且审批链条长,容易错失市场窗口。相比之下,数字普惠金融则以小额、高频、随借随还特征,较大程度上填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长尾”空白。传统融资注重“物的信用”(抵押物),而数字普惠金融注重“数的信用”(数据)。两者互为补充,传统模式构筑了企业融资的基石,数字普惠金融则织密了毛细血管般的微循环网络。

二是不同规模企业获益程度的比较。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辐射范围内,不同规模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获益特征。对于大型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本身拥有较强的预算约束背景和丰富的传统信贷资源,数字普惠金融更多是起到辅助提效的作用。然而,对于民营企业 and 中小微企业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则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性支持,有效缓解了其融资困境。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传统金融在信贷资源配置上的选择性,使这些长期处于信贷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够获得更加平等的融资机会。实证研究普遍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及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最为显著,突出体现了其“普惠”的本质。

三是短期流动性纾困与长期创新激励的比较。从资金用途的时间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既具备短期流动性纾困的功能,也蕴含着长期创新激励的潜力。短期内,依托纯线上信用贷款,企业可以快速解决发工资、交房租、垫付货款等燃眉之急,避免资金链断裂引发的连锁反应。长期维度上,随着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生产经营场景的深度绑定,通过基于订单的预付款融资、基于库存的动产质押融资,金融机构能够更敏锐地捕捉高成长性企业的潜在价值。这种深度的产融结合,不仅解决了企业当下的生存问题,更为企业跨越技术转化的“死亡之谷”提供持续驱动力,从而实现了从单纯“输血”到助力“造血”的转变。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融资的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融资面临的现实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数字普惠金融高度依赖多维数据的采集与整合,而涉企数据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及经营底线。因此,如何在打破“数据孤岛”、实现信息共享的同时,防止数据被滥用或泄露,是当前亟需解决的现实难题。

二是算法黑箱与风控模型的同质化风险。企业若过度依赖历史数据和单一算法,可能导致部分信用记录空白的新兴业态企业受到系统性排斥,增加其融资难度,进而阻碍新兴企业的发展步伐。此外,多家机构若采用相似的风控模型,一旦遭遇宏观环境波动,极易引发抽贷、断贷的踩踏效应,加大企业金融风险。

三是部分中小金融机构虽然接入了数

字平台,但对数字人才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复合型人才短缺与算力支撑薄弱,使得智能化的信贷决策流于形式。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融资的优化发展,其路径展望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筑牢数据要素的制度底座,构建可信数据空间。一方面,需进一步完善涉企信用信息的法律法规,明确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的边界,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融资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推广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前沿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在保障企业商业秘密的前提下,促进政务数据与商业数据的深度融合。此外,还应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建立服务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等特定产业的特色信用数据库,为精准画像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原料,同时对高新技术企业制定保障其行稳致远发展的靶向性政策。

二是推进风控模型的迭代升级与透明化。金融机构应避免陷入“唯算法论”的误区,将专家经验与机器智能建议相结合,开发具有较强可解释性的风控模型,以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同时,需构建跨机构的风险联防联控机制,防止因算法趋同而引发的顺周期风险。此外,还应增强对长尾群体的包容性评估,通过引入替代数据源,弥补传统征信体系的不足。

三是强化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与能力建设。中小银行及地方金融机构不应仅满足于线下业务的线上化迁移,而应加快构建全栈式的数字金融能力。一方面,需加大金融科技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力度,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融资夯实人才基础;另一方面,应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开发定制化、场景化的数字信贷产品,实现从单纯的“资金搬运工”向“综合金融服务商”的转型。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企业融资模式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它以灵活、普惠的优势优化资本结构、重塑信用资产,增强抗风险能力,并与传统融资互补共进,共同完善现代化融资格体系。未来,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和技术迭代,数字普惠金融将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企业应主动拥抱这一趋势,持续优化融资策略,方能在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充分释放其制度红利。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重构思政课程体系 破解产教“两张皮”

本文从运行机理、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三方面,系统阐述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思政协同育人的逻辑与实践,旨在为深化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提供思路与借鉴。

向宇航

产教融合是开放经济背景下高校深化内涵建设的基本办学模式,也是推动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然而,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仍面临与产业需求脱节、价值引领与技术培养相割裂的现实困境。随着产业转型持续深化,思政课亟需突破传统的封闭格局,主动将企业规范转化为教学内容,融入工匠精神和责任观等核心要素,着力培养兼具产业洞察力与工匠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产教融合下高校思政协同育人的运行机理

一是以产定教,思政与产业同频共振。产教融合的关键在于使思政教育内容适配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应根据不同产业的岗位特征和职业素养要求,动态调整思政教育内容,将产业对劳动者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的期待转化为思政教育的培养目标,推动思政教育供给侧与产业发展需求侧精准对接,确保思政教育与产业协同共进,共同服务于职业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二是因材施教,分类分层精准设计。高等职业院校应根据不同专业和岗位特点,定制差异化的思政教育内容,使思政教育更加契合职业发展需要。同时,要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分层设计引导方案,满足学生提升思想素养的多元需求,实现价值引领的精准覆盖,确保思政教育真正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

三是双师共育,校企资源深度联动。校内教师负责传授思政与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夯实学生的理论素养;企业导师则立足一线实践,挖掘鲜活思政案例,将职业精神与行业规范转化为教学素材,使思政教育更具职业情境感。

产教融合下高校思政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

一是目标错位,思政教育与行业需求存在落差。部分高校思政课仍局限于理论灌输,未能有效契合产业升级对职业素养的实际要求。在课程设计中,高校往往按既定思政理论框架规划教学内容,缺乏对行业企业的主动调研,未能深入了解不同岗位对从业者职业精神与道德素养的具体需求,因而导致思政教育内容与产业实际需求之间出现脱节。

二是协同薄弱,校企合作缺乏深度联动机制。当前,多数校企合作仍停留在实践基地挂牌、企业人员偶尔入校讲座等浅层阶段,尚未围绕思政育人目标构建系统的协同合作机制,分工权责不够明确。双方难以形成育人合力,思政教育在校园与企业场景之间无法实现无缝衔接。

三是反馈滞后,过程性考核与产业反馈不足。传统考核以期末笔试成绩为核心,缺乏对学生实习实训、岗位实践中思政素养表现的过程性记录与评价。企业虽然掌握学生在实践中的思政素养实际情况,却很少参与思政育人评价,高校无法依据产业端的反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考核评价难以充分发挥促进思政育人质量提升的作用。

产教融合下高校思政协同育人的进路探析

一是构建“校-企-行”协同生态。高职院校应主动邀请合作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破除高校独立开展思政教育的局限;同时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定期组织思政教师、企业管理人员和行业专家开展研讨,围绕产业端提出的思政教育需求及时更新育人共识,有效解决协同育人中权责不明、衔接不畅等问题。

二是开发车间思政与项目化教学。真实企业场景是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珍贵的思政育人案例。围绕企业项目开展思政教学,分解育人目标并融入各环节,引导学生团队协作完成项目,加深对职业规范、行业价值的理解,同步提升专业技能与思政素养,实现“做中学、学中悟”的育人成效。

三是建立德技融合多维评价体系。围绕“德”与“技”构建分层分类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推行校企协同的评价机制,促进评价主体多元化。由高校思政教师、职业规划教师与企业导师共同组成评价小组。高校教师侧重考核思政素养与职业规划理论知识,企业导师则侧重评价产业实践能力、职场思政素养和职业适配性。不同评价主体依据学生在不同场景中的表现给出多元评价,全面呈现学生在产教融合学习中的综合发展状况。

四是校企师资双向流动提升跨界能力。高等职业院校应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积极推动校企双向挂职交流。同时,健全配套保障制度,将教师企业挂职经历纳入职称评审和绩效考核参考,落实企业骨干进校授课的教学认定与待遇保障,激发校企人员双向流动的的积极性,着力打造跨界育人师资队伍,为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作者单位: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本文系2024年中共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委员会第二批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革与精品建设项目“新时代民办高校推进高质量思政课建设研究——以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为例”(编号:HKDS2024YB13)阶段性研究成果]

数智赋能校企协同：企业从边缘参与到深度融入

陈星怡 马安琦 向楚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时代新人的核心要求。当代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其思想成长深受互联网环境影响,数字空间已成为价值塑造的重要场域。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和多元思潮冲击,高校传统育人形式难以实现全方位的价值引领。与此同时,掌握流量入口、具备技术优势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正日益成为影响大学生思想观念的重要力量。但当前多数企业仍局限于“用人单位”“校园赞助商”的浅层定位,校企合作流于表面,企业的育人潜能远未释放,由此形成了“高校主导、政府推动、企业缺位”的格局短板。因此,引导企业从育人“旁观者”转变为“赋能者”,构建多元共治的协同育人新格局,已成为提升育人实效、助力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

校企协同育人主体重塑与治理转型

一是主体定位的转变。传统校企合作多集中于实习基地建设、校园招聘宣讲或经费赞助等浅层领域,本质上属于基于利益交换的市场合作关系。数字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企业的社会属性和功能定位,既为其深度参与育人工作提供了可能,也赋予其新的责任使命。一方面,抖音、B站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占据着大学生的主要注意力场域,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事实上承担了部分社会教化功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普及使企业有能力打造高质量、多样化的思政教育内容,打破了传统思政教育在时空和形式上的局限。基于此,企业需突破单纯的市场主体身份,向承担社会责任的治理参与者转型,主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融入产品设计、内容传播和服务供给全过程。这既是企业商业价值向社会价值的延伸,也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彰显社会担当的必然选择。

数字时代,企业如何从“旁观者”转变为“赋能者”?本文立足数字技术赋能背景,聚焦校企协同育人的主体新定位、合作新机制与现实挑战,系统探析多元共治育人模式的构建逻辑与实践路径,为校企协同培育大学生、夯实立德树人育人成效,提供有益思考与实践参考。

二是合作关系的升级。长期以来,校企合作面临沟通不畅、资源对接不便、合作落地困难等问题,许多合作仅停留在“签协议、拍照片”的层面,难以形成常态化、深层次的协同育人格局。数字技术的应用,有效打破了校企之间的物理隔阂与信息壁垒,推动合作从“点对点”的线性模式,向“多中心、扁平化”的跨界协作网络转变。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平台以及企业微信、钉钉等协同办公软件,政府、高校、企业之间能够实现信息实时共享和资源高效对接。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紧密连接,构建起“政府引导、高校主导、企业参与、学生受益”的协同网络,为常态化、深层次的育人合作提供了坚实支撑,也让校企合作真正摆脱形式化束缚,走向实质化发展。

校企协同育人信任构建与机制优化

一是筑牢信任根基。信任是校企协同发展的前提。过去,高校常常顾虑企业参与育人工作的动机,认为企业更多是出于品牌宣传或降低人力成本的考量,未必能真正投入资源落实育人举措;企业则担心自身投入的技术、资金和人力难以获得相应回报,也难以招到真正契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优质人才。这种双方互存疑虑的局面,让校企协同育人难以向深层次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打破这一困局、构建校企互信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方面,企业可通过数字化手段,公开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借助区块链存证技术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点,能对校企合作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全程记录,形成可核查的“数据铁笼”。这种全程可追溯、可验证的方式,让企业的育人行为更加透明,也使高校的育人需求得到切实回应,从而在高校、

企业和学生之间建立起坚实的信任基础,为双方深度协同育人扫清障碍。

二是完善协商机制。传统校企合作往往缺乏真正有效的动态协商渠道,合作内容固定、形式单一,难以适应数字时代大学生思想动态的变化和育人需求的升级。数字时代的协同治理,需要建立常态化、动态化的互动协商机制,以确保精准对接需求、及时调整优化。借助协同办公平台和社交媒体群组,高校可根据学生思想动态和民族文化认知短板,向企业提出教育内容定制需求;企业则可依托大数据反馈,及时调整宣传策略和教育内容,优化呈现形式,提升育人的针对性与吸引力。同时,大学生也可作为协同治理的参与者,通过融媒体平台表达对教育内容的感受和建议,形成“高校提需求—企业创作供给—学生反馈优化”的闭环。这种双向互动、实时反馈的协商机制,使教育内容既“有意义”——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又“有意思”——贴合大学生的认知特点,真正实现入脑入心。

校企协同育人路径纠偏与责任厘清

一是防范目标偏移风险,强化价值引领。企业参与协同育人是构建多元共治格局的必然选择,但在协同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目标导向,避免商业逻辑挤压育人公共价值。企业在市场运营中,有时会侧重于流量表现与商业回报,这可能影响其对重要思政议题传播分寸的把握;若把握不当,协同治理便可能偏离立德树人的根本初衷,影响育人效果。对此,需通过正向引导和制度规范加以应对:政府可出台相关引导规范,明确协同育人的价值导向和行为标准,引导企业规范内容创作和技术应用,并对不符合规范的企业进行正向督导整改;同时,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打破“唯流量论”,引入“学